

创造丛书

张刚著



风流局长

FENG LIU JU ZHANG



054048

I235
1272

风流局长

——张刚电影剧本选

海峡文艺出版社

风 流 局 长

——张刚电影剧本选

张 刚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5印张 2 插页 167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70

书号: 10368·94

定价: 1.40元

创造丛书编委会编委：

丁章林	马 戎	从维熙	许立言	刘绍棠
刘宾雁	刘德胜	何 为	苏叔阳	李 栋
李玉光	李锦炎	张 弦	张天民	张兴强
张贤亮	杨光中	罗华俊	卓钟霖	茹志鹃
郭 风	郭伟强	莫应丰	秦 牧	高晓声
顾笑言	鄂 华	温元凯		

常务编委：

丁章林 李 栋 李玉光 李锦炎 卓钟霖

本辑执行主编：

李 栋 卓钟霖

（以上按姓氏笔划排列）

目 录

张刚和他的作品（代序）……………周崇坡

笑出来的眼泪……………（15）

丈夫的秘密……………（96）

风流局长……………（188）

张刚和他的作品

周崇坡

一米七十以上的个子，魁梧的身躯，黝黑的皮肤，方盘脸膛，浓眉大眼，机俏而憨厚，热情而奔放，幽默而善良，强烈的事业心和日夜兼程的干劲，坎坷的遭遇和永远乐观的性格……，这就是本书作者、影剧作家张刚。

张刚生于一个民族危亡、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一九三二年隆冬，当他降生到这个苦难的人世时，他的故乡黑龙江省绥化市已沦于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在日寇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个时代和他那善良、勤劳、倔强的母亲，给他上的人生第一课，便是苦难、仇恨、反抗和斗争。

他父亲是个抗日军人，“九·一八”以后离家跟着抗日民主联军，驰骋战斗于茫茫的白山黑水之间。在敌人统治区，一个情况不明、生死不详的抗日军人家庭，处境的艰难，生活的困苦，自不待言。母亲坚强、乐观，充满信念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帮人洗衣、缝补，出外干零活，当保姆，

从早到晚，从岁初到年尾，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买来粗砺的食粮，养育嗷嗷待哺的三个子女。艰辛的生活，勤劳的母亲，给幼小的张刚以深刻的影响。这也许就是铸成他性格中坚强、乐观一面的重要因素。

在他十七岁的时候，生活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九三九年春，正当杜鹃花开满山野的时节，多年无消息的父亲，找到了他们。他从谁也瞧不起的洗衣妇的儿子，一跃而为高级军官的少爷，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提高，过着他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然而，由于父亲生活上的奢侈淫靡，陆续娶了几房姨太太，家庭的纷争和多种矛盾愈趋加剧。母亲自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精神上、心灵上受到强烈的震荡和刺激，最终由于过度忧郁酿成重病瘫痪在床。当母亲最需要体贴照料之际，父亲带着姨太太遗弃了他们远去它方。尝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被遗弃的痛苦，仿佛从一个高高的山峰落入深深的山谷，十二岁的他感到惘然和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动着一种向命运挑战、向生活抗争的冲动：他要用自己的手来养活母亲，开拓人生的前程。当然，那时他还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拿起神圣的笔，向着戏剧和电影艺术的殿堂进军；更没有奢望成为一个作家、导演和演员。

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张刚在漫长的五年间，经历了“高尔基式”的人生：他在南京街头卖报，新街口、夫子庙、下关车站、轮船码头，都印下他的足迹；他在大街小巷拉板车，沉重的货物压着他那稚嫩的肩膀；他做小贩，卖香烟火柴，卖糖果小吃，以微薄的“辛苦钱”养家糊口；他还打短工，扫院子，倒茶水。总之，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结交了众多

的友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平，积累了较为厚实的生活功底。

在这四、五年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他与进步的东北流亡学生接触。当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正处于尖锐激烈的斗争阶段。进步的东北流亡学生，为了反内战、反饥饿，为了求生存、求解放，从关外长途跋涉来到南京请愿。他从他们的请愿斗争中，看到青年人的磊落胸怀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他从他们那儿借来不少进步的文艺作品：狄更斯、高尔基、巴金、茅盾等中外作家的小说、戏剧，给他这个物质生活上贫困、而精神文化生活上更为贫瘠的青年，注进了极为有益的多种营养。从那以后，他才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能开拓视野、净化心灵、给人力量、催人奋发的进步文艺。这一点对他以后从事戏剧活动和电影创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另一件事是他在卖报生涯中，广泛浏览了众多的小报，特别是阅读了那些连载故事，从中学得一些文字功夫和写作技巧。于是他就利用卖报的间隙和夜晚，也在大大小小各种色泽的纸上，写着，画着，用以编织各种故事。天上人间，悲欢离合，飞禽走兽，侠士义盗，生活中的悲苦辛酸、奋进抗争、流血牺牲，连同他那年轻心灵中的正义、不平和爱憎，一起流泻到纸上，成为他最初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作者随写随撕，当然不可能留存下来。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创作的启蒙阶段。没有它，也许就不会有以后和今天。

二

当张刚迎来祖国的解放时，才十七岁，他在著名话剧、

电影演员吕玉堃领导的大众剧团当演员。

年轻的张刚心里，荡漾着春的欢乐、春的希望；演戏、导戏、写戏织成的瑰丽光圈，不时在他的想象和幻觉中出现；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剧作家，写出讴歌祖国春天和人民心愿的剧本，拍出象喜剧大师卓别麟那样的让人笑出眼泪来的喜剧影片，他将自编、自导、自演，贡献出他的青春和才华。

正是出于这样的崇高愿望，他参了军，被分在第三野战军文工团戏剧队。他以为自己有美好的理想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到戏剧队肯定是当队长无疑。谁知分到队里，当召开排以上干部会时，他充满信心地前去参加，并申述他的理由，惹得与会者善意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大笑了一阵。生活中这类喜剧性的事情，反映了他的单纯、天真、乐观、诙谐的喜剧性格，这也许就是他以后孜孜不倦地探索与追求喜剧艺术的重要原因。

在戏剧队期间，结合革命形势和任务，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稚嫩的笔触，写下了一系列戏剧和曲艺作品。他的速度相当惊人，常常是接受任务稍作考虑后，就不停笔地写，三五天，两三天，甚至一个夜晚，便完成了一个作品，被誉为戏剧队的一枝“快笔”。由于太快，无庸讳言，有不少作品的质量不高或不太高，只是起到配合部队的作用。但也有作者下了功夫，经过精雕细琢，因而思想、艺术质量不错的作品，如话剧《火线春节夜》，在三野全军会演时，受到广泛的欢迎与好评，荣获剧本二等奖。他因此受到巨大的鼓舞，树立起坚定的信心，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和灿烂的前景。从此以后，他的创作如决堤的潮水，奔涌流淌，一直没有间断过，除了动乱中挨批挨斗的年月以外。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风暴”刮来之前，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滑

戏剧《花样百出》、《偷食猫》，小说《偷运军火的人》，喜剧《高科长的礼拜天》，话剧《三颗心》、《井岗山人》等。话剧《劳工万岁》，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背景，热情讴歌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的革命胆略和可贵精神，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初期工人斗争的壮丽画卷。该剧由江西省话剧团演出和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好评。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和雪草、刘云、超凡三同志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编写的话剧《八一风暴》。这是他创作历史上最有光彩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剧本以鲜明的历史背景、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真实地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起义的伟大历史壮举，生动地塑造了起义领导人、起义军指战员、工人、农民以及敌人营垒中各色人等的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江西话剧团携带此剧赴京汇报演出期间，曾光荣地被邀在中南海礼堂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演出，获得成功，备受赞誉。在新中国戏剧文学的发展史上，话剧《八一风暴》有它一定的地位。

六十年代前期，他为了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集中于他梦寐以求的“东方喜剧”的探索上；离开了江西话剧团来到南昌市文工团工作，担任编导，又兼任演员。他对当时一些配合政治任务、又十分严肃、不能让人卒看卒读的剧本，颇为不满。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丰富多彩的；反映生活和人民意愿的戏剧作品也应是多姿多彩的；不论是题材、体裁、风格和手法上，都要力求多样化，避免单一化。人民需要正剧、悲剧、抒情剧，同时也需要喜剧和悲喜剧，这正象人民需要吃含有各种营养、具有多种口味的菜肴一样自然合理。

可是，当时“左”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习惯于把运用讽刺、夸张、误会、巧合等手法，揭露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阴暗面和缺点的喜剧，一概批判为反现实主义，从而事实上阻碍了喜剧艺术的迅速发展。张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敢于抛弃个人的得失安危，一头钻到喜剧艺术事业中去，除了志趣爱好外，更多的是让人看到作为社会主义戏剧工作者和剧作家弥可珍贵的巨大勇气和追求精神。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创作、排练、演出了《喜新风》、《该谁检讨》、《除夕之夜》、《笑的晚会》等喜剧作品，为丰富全省人民的文化生活，探索与发展喜剧艺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张刚是富有喜剧性格的人，然而，由于他的直率、俏皮、幽默、爱说爱逗，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因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扮演悲剧的角色。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一九六一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九六四年以“革命化”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他无不充当了悲剧性的“运动员”。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的悲剧色彩达到了更浓更重的地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挨斗受批、挂牌游街，蒙受了不白之冤和不公正的待遇。即使在那样的年月，他也始终没有丧失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电影、戏剧和喜剧事业的热爱。在他案头玻璃板下面压着一条“座右铭”，强烈地宣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挫折，他都要以狮子般的勇气，为他衷心热爱的影剧事业而奋斗。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刚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春

天。可称“历尽风霜君更健，电影更继戏剧篇”。确实，在新时期和煦春风的吹拂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雨露的滋润下，他更加精神焕发，充满信心，以令人羡慕充沛的精力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把重点转移、到电影电视创作方面来。几年来，他和吕玉堃合作了《女大当嫁》（上影拍摄），和毛秉权合作了《五号机要员》（长影拍摄）、《愁眉笑脸》（江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和其他人合作了《悔恨》（江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等电影剧作。它们或以犀利的笔触，谐趣的风格，反映出拨乱反正阶段，从农村生产大队到城市工厂企业所存在的种种矛盾。有的与千百年来的封建思想和习惯势力有关，有的与“四人帮”的破坏、规章制度未能健全相连；或以引人入胜的戏剧悬念和惊险曲折的情节，把观点带到已逝的历史故事和地下斗争中去，让今天的人们领略革命工作者在艰险环境中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风貌。这些影片的社会效果和观众上座率都是比较好的。

一九八三、八四两年，张刚在编写、导演电视剧《九月菊》、《相遇》等的同时，以短跑运动员的冲刺精神，陆续写了电影系列剧本《笑出来的眼泪》、《风流局长》和《丈夫的秘密》，这就是本书所收的三个剧本。

关于电影、电视和戏剧创作，他有一个“理论”或者称之为“目标”：即作品要使领导满意、专家满意和广大观众满意。“三满意”的剧本究竟是否存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达到什么标准和水平，这里且不去探讨。因为他的本意并非讨论什么理论问题，而是追求影剧作品要尽可能写得、拍得和演得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既有教育性，又有娱乐性，并且寓教于乐，给人以愉快和美的艺术享受。如是这样，本书中的三个剧本无疑是他主张付诸实践的产物。

关于喜剧风格，他也有一些“零星的想法”。他主张喜剧一定要使人笑：微笑、浅笑、嘲笑、大笑、捧腹的笑，笑到前仰后合，笑出眼泪，笑后又让人深深思索、再三回味。他认为美国喜剧大师卓别麟的影片如《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就有令人从头笑到尾，笑出眼泪，笑后还要思索回味的艺术魅力。他还认为，喜剧必须辛辣。喜剧是将生活中无价值的东西和丑恶的事物撕破给人看，因此作者应当是生活中的勇士，敢于敏锐洞察、大胆揭露和巧妙表现，反映出社会生活必须克服的顽症痼疾，鞭挞阻挡历史前进的落后势力，使人笑中有思，思中有笑，又觉好笑又觉深刻。这才是优秀喜剧理应达到的艺术境界。这些被作者谦称为“零星的想法”，其实倒真是喜剧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很可贵的是，作者在剧本创作实践中努力进行这种探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电影系列剧本的第一本《笑出来的眼泪》，以喜剧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从文艺界这一角度，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从“革命化”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社会悲剧的一个侧面，新颖别致而发人深思地揭示出极“左”路线对于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大颠倒，给人们思想灵魂上的惊人污染。今天，这场全民族的浩劫虽已过去，但反思曾经发生的一切，仍使人有振聋发聩之感。

电影如何富有新意地反映这段历史，哪怕是历史的一段，一个侧面，都是比较艰难的。因为观众与读者对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已经读过和看过很多，其中有长篇小说《将军吟》，短篇小说《班主任》、《枫》、《记忆》，电影《结婚》、《不是为了爱情》、《生活的颤音》等等。毫无疑问，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各不相同，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也不一样。但是，还很少或者没有看到过用喜剧形式和手法来表现悲剧性的故事。正是这点上，《笑出来的眼泪》使人耳目一新。剧中主要人物何阿满在故事快结束时，对白珍意味深长地说：“喜剧总是使人焕发青春，获得生命，比以前更年轻！”一个经历了恶梦般动乱的国家，一个大病初愈的民族，一个存在着“问题成山，困难成山，麻烦成山”的社会，自然需要鞭辟入里地对于悲剧现象的揭露，对于悲剧原因的寻找，却更需要着眼于今天和明天，鼓舞人们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因此对于过去的反思，若能从荒谬颠倒中使人感到发笑，笑出眼泪，不是同样也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么？而且，由于它寓教于乐，其功能和作用也许会更有效些。

何阿满是个喜剧演员，喜剧事业的探索者和献身者。他善良、慈厚、谦和、诚恳；事业心十分强烈，为了事业他可以做出任何牺牲；事业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他说：“我不想别的，真的，实在不想招谁、惹谁，只想能让我干我爱的事业。”这样一个忠诚、积极的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本可以大大发挥他的才能，为喜剧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与迫害，他却是道路坎坷、命运乖桀、历尽磨难。“文革”前的“革命化”运动中，由于他热衷于演《该谁检讨》等喜剧，遭到种种无理的指责与批评，差一点没让揪出来。“文革”中更是大难临头，什么罪都受过。“历尽苦难性不变”，阿满以乐观的眼睛看待生活，以喜剧演员的诙谐嘲讽假丑恶的事物。剧中写他挂牌游街时，敲出各种锣鼓经，烈日暴晒时巧妙地用水龙头喷水给即将渴死的受难者，都反映了他的这种性格。

钟坚则是个思想灵魂上被极“左”路线污染的人物。他是文化局的一个科长，却不想也不知道应当以自己的精力和才智去抓好文化工作，丰富演出剧目，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只知秉承上意、讨好领导，卖力地执行极“左”路线，千方百计地去整无辜的演员。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子白莉完全是一种封建家长式或私人财产占有式的关系，没有真诚，没有和谐，没有爱情。白莉一针见血地揭露他：“你需要一个完全属于你的妻子。”连枝间鸣噪的蝉仿佛也在叫着，钟对白的感情是“假的，假的，假的”。

白莉是个美丽、热情、真诚的青年妇女。由于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原因，她与钟坚结合。这种没有爱情、没有心灵交流的夫妻关系，使她痛苦、厌烦，她感到无法摆脱的遗憾。她爱看喜剧，崇敬阿满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磊落的人品，她爱着阿满，那样真挚而炽烈。她处于钟坚与阿满之间，不仅经常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之流所撞击，而且通过他们提高她的认识，坚定她那为真理而斗争的决心。剧中当阿满被隔离审查、钟坚找他谈话时，白莉出现在两人之间，有一段内心独白，细腻、真切地描绘出她的思想性格，也进一步深化了剧本的主题：“他们两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是整人的，一个是被整的；整人的似乎代表着正义，被整的却只好代表着邪恶。我讨厌这无情的颠倒！为什么整人的永远有理？被整的活该遭难？有理的从来不务正业，遭难的理应受到摧残！真理啊，你在哪儿？好与坏、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黑与白，为什么在革命的外衣掩盖下全都给颠倒了呢？”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执着灵魂，对于那个颠倒了一切的时代的痛斥。白莉最后虽然病死了，但她的正义之声，仍

在阿满们的耳畔萦绕。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被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真理放射出本来应有的夺目光辉。

《丈夫的秘密》原名《飞将军外传》，取材于历史进入新时期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进行的与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社会生活。作品仍由阿满这个人物贯穿全剧，不过他的职业已不是剧团的喜剧演员，而是工厂里的锻工和业余侦察员。一个普通工人，在生产工作之余，自觉自愿地担负起协助公安部门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积极追捕铁龙流氓犯罪集团分子的任务，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包括健全民主和法制的必然结果；也是经过拨乱反正，党风、民风，特别是社会风气好转的重要表现。电影作品表现法制领域的斗争，反映维护法制的主题，讴歌阿满们在斗争中的忠诚、积极、机智和勇敢，应当说是很有意义，并且非常符合时宜的。

这个作品的主要艺术特色，仍然是它的喜剧性，以喜剧的形式与手法，叙述一个有时紧张惊险、有时峰回路转的故事，并且有一条丈夫瞒着妻子、妻子关心丈夫的副线相映衬，更使情节的发展错落有致、别开生面，使人不时漾出内心的微笑，甚至爆出捧腹的大笑。阿满有一个善良而胆小的妻子，她真挚地爱着他，因而对他的言行表现了过分的关切。这就使他不敢将协助公安局追捕犯罪分子的事告诉她，而成为“丈夫的秘密”。这个秘密，引出种种误会和笑料，既增强了作品的喜剧特色，又刻划了阿满夫妻俩的性格。

《风流局长》所反映的是人们热衷的当今的改革题材。剧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截取了文艺界的一段故事和几个人物，反映出时代改革的某个侧面。剧本通过新上任的文化局长曹阿满“抓住电视、带动改革”的过程中，为解决本

子、导演和演员问题而引起的风波与矛盾，较为真切地揭示出改革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热情歌颂了曹阿满的正派、正直、果断大胆和雷厉风行的改革者性格，以及敢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善于启用人才的胆略。

经济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的改革，都充满着矛盾斗争。因为它要触动的是各个领域一切阻碍四化建设发展的不合理的东西。改革者面临的对手是强大而复杂的，其中有“左”的残余，右的干扰，帮派势力的搅和，习惯力量和因袭心理的阻碍，这一切组成一种强大而顽固的反对改革的力量。

《风流局长》并不企图全面反映改革生活，但仅就它描绘的马科长、冯科长们的反对，邱主任们的消极，钟坚们的胆怯，尤其是白娟这类女人的造谣诽谤、搬弄是非，也可看出改革者曹阿满所从事的改革事业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剧作不仅比较真实地揭示了改革的矛盾，而且符合生活逻辑地写出了矛盾的结局：改革的第一回合以电视剧拍摄成功获得领导的首肯、反改革的力量遭到挫折而告终；剧本最后点出，曹阿满将以更大的决心与魄力投入文化局机关的体制改革。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个改革与反改革的题材，作者仍以他擅长的喜剧风格加以表现，而且写得诙谐、幽默、令人发笑，又比较有分寸，是很不容易的。

之所以把《笑出来的眼泪》、《丈夫的秘密》和《风流局长》，称为电影系列剧本，或者如作者所说的“阿满的喜剧”，除了它们同是由一个同名共姓的主要人物阿满贯串全剧，同是喜剧形式、喜剧风格和喜剧表现手法外，从它们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看，无疑也有它们的连续性。